

〈論説〉

政治喉舌与公共论坛的两重性

——后五四时期《时事新报》与知识精英

赵 泽 瑄*

摘要：对于后五四时期的上海四大日报之一的《时事新报》，以往究皆视其为研究系的机关报，未能充分揭示该报在1920年宣称打造“全国文化运动的机关”前后一系列改版的历史意义。本文从关系的视角出发，从政治背景和撰稿人群体两个层面揭示该报所聚合的社会交往，进而提出：改版后的《时事新报》具有政治喉舌与公共论坛的两重性：一方面，该报是研究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肩负着“改党造党”的政治使命，但最终为国民革命形势所迫脱离了研究系。另一方面，该报言论栏目逐渐聚合起一批由江浙地区为主的知识精英组成的撰稿人群体，他们大多从事文教事业且无政党背景，构成了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之间的“中间势力”。就此而言，《时事新报》言论的代表性并非局限于研究系，而是相当程度反映了一般知识界对政局变动的认识。

关键词：五四运动；《时事新报》；研究系；知识精英；中间势力

要旨：ポスト五四時期の上海の四大日刊紙の一つである『時事新報』は、それまではもっぱら研究系の機関紙と見なされていましたが、一九二〇年に「全国的な文化運動の機関」と宣言した前後の改版の歴史的意義を十分

* 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ommelchao@foxmail.com，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3RXW194）相关成果。

に示す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本論は関係の視点から出発して、政治的背景とライターグループの2つの次元から同紙が集約した社会的交流を揭示して、更に提起します。改版後の『時事新報』は政治の舌と公共の論壇の二重性を持ちます。一方で、新聞は研究系の文化事業の重要な構成で、「党を変えて党を作る」という政治使命を背負って、しかし最終的に国民革命の情勢のために研究系を離脱しました。一方、この新聞の言論欄は次第に江蘇、浙江地区を主とする知識エリートからなるライター群を集め、彼らの大部分は文教事業に従事し、政党の背景もなく、北洋軍閥と国民革命の間の「中間勢力」を構成しました。このように、『時事新報』の発言の代表性は、研究系に限らず、一般の識者の政局変動認識をかなり反映しています。

キーワード：五四運動、『時事新報』、研究系、知的エリート、中間勢力

一、研究缘起

报纸是一种交往关系。¹基于报纸所属社会群体的差异，李金铨指出民国时期主流报纸可分为三种范式（paradigm）：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人办报最有钱”、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文人办报最受尊重”、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党人办报最有权势”。²随着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报纸所聚集的社会关系时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而那些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则构成了界定报纸范式的基础。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报业，《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并称为四大日报。其中，复旦大学新闻学者郭箴一在《上海报纸改革论》中

1 黄旦：《报刊是一种交往关系——再谈报纸的“迷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96页。

2 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42-254页。

评价《时事新报》为“特立独行”：

云何特立独行？曰一于言论见之，曰一于言论见之，丁此叔世，舆论界所感痛苦，举国僉同。《时事新报》以和平的革新为态度，无时无事，无不婉转曲折；以畅其意。故长篇社评，二十余年殆未或闻；迄今隸言论系，从事述述者凡六人，所耗虽多，博得智识阶级同情者，此其主因。³

实际上，自1907年创刊至1949年停刊，《时事新报》始终秉持“文人论政”精神，将言论栏目视作核心功能。而对于北洋政府时期《时事新报》，以往研究皆将其视作共和党—进步党—研究系阵营的政党报刊，这一阵营与同盟会—国民党的政党报刊形成舆论对垒之势。⁴固然，《时事新报》为梁启超为首的政党主办，但该报言论是可完全视为研究系的党见则尚存可议之处。这缘于以下因素：其一，区别于高度组织化、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机关报，资产阶级机关报的管理方式较为松散、报馆同人流动性高，因此报纸在贯彻党见之外亦能一定程度吸纳社会意见。⁵其二，后五四时期，研究系逐渐从政客团体演变为文化社群，建立起《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杂志和讲学会、中国公学组成的“三位一体”文化事业。⁶其三，《时事新报》在1920年元旦宣布由政党报改版为“全国文化运动的机关”，对新闻、副刊和言论进行全面改革，其中言论栏目自1922年6月起划分为“社评”和“时

3 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第19-20页。

4 1. 以往《时事新报》研究大多聚焦于《学灯》副刊，缺乏对《时事新报》言论栏目的实证分析。方汉奇、曾虚白、马光仁、陈忠纯等新闻史学家主要从办报背景的角度提出《时事新报》为共和党—进步党—研究系的宣传机构。参见：1.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88-699页；2.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第336页；3.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0-363页；4. 陈忠纯：《民初的媒体与政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38页。

5 钱晓文：《民初政党报刊与政党政治》，《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4期。

6 吴炳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及其基础》，《史林》，2002年第1期。

论”，主动扩大社外稿源，形成了一批以江浙知识精英构成的撰稿人群体。基于此，本文认为后五四时期的《时事新报》呈现出范式的两重性：该报既是研究系的宣传机构，亦是知识精英论政的公共论坛。下文将从党派背景、撰稿人群体两个层面揭示该报言论所表征的政治公共体。

二、政治喉舌：研究系的文化转向与《时事新报》改版

众所周知，研究系是1916年由梁启超、汤化龙领导的，以原进步党主要成员改组而成的政客集团，他们主张改良议会政治和政党风气，拥护皖系军阀段祺瑞实现中央集权并将国民党视作“暴民政治”对抗之。⁷然而，1918年研究系在国会败选于段祺瑞控制的安福系之后，梁启超等研究系诸人痛心疾首，决定“从思想界尽些微力”，⁸于是利用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以及中国公学、共学社等文化机构传播改良宪政理念，培养市民社会。

在此背景下，《时事新报》于1920年元旦颁布改版宣言：“以前的本报是个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报，从今天以后就是要偏重于社会方面了……我们愿意把这张小小的报纸公开做全国文化运动的机关。”（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宣言发布前后，《时事新报》版面功能的变化包括：其一，提升副刊格调。1918年3月《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取消“黑幕”专栏，首创学术型的《学灯》副刊：“其旨有三：一曰籍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间，广商权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时事新报，1918年3月4日）其二，增设“工商之友”栏目，对工商界职员进行文化启蒙：“本栏的宗旨是用极显的文字，介绍极切要的企业、金融、贸易、制造的智识，启发店员职工等对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的观念。”其三，重视国际报道，建立驻外记者制度，“增设欧美日本各大埠通

7 谢彬：《民国政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8页。

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56页。

信员，并延请专门学者分任编辑述有系统之世界大事的经过。”（时事新报，1919年12月31日）

上述改版举措促使《时事新报》在上海报业的地位迅速升腾，取代此前《时报》在文教界的权威地位。出版家张静庐称：

“《时报》的主编者，不晓得迎合时代潮流，并一张副刊都不肯出版，仍保留其‘余兴’‘小时报’的老套头。因此，《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应时而起，延宗白华为主编，撰述者都是一时之选，于是学界极表欢迎。《时报》十余年来在教育界裹所打下的根基，不能不动摇，以致于倾坍。”⁹

在江苏无锡，《时事新报》是中学阅报室主要订阅的上海报纸之一。曾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中学的《大公报》记者徐铸成回忆：“二十年代初，我们中学的阅报室里，只有五份上海报——《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比较适合青年阅读的是《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民国日报》的《觉悟》。从这里，了解到不少新的知识、学术界动态和国际上的各种思潮。”¹⁰除了上海日报普遍辐射的江浙地区外，《时事新报》在日本留学生和内陆省份的文教界也颇有影响。在日本福冈，《时事新报》是郭沫若主持新闻通讯社——夏社期间唯一订阅的一份国内报纸：“因为老做这种义务的通信社活动，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阅一份。我们订阅的是上海《时事新报》。那个报纸在五卅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副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¹¹在湖南长沙，《时事新报》是福湘女校教师舒新城组织学生读报的重要读物。为增进学生对于中国历史与国情的认识，舒新

9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4-45页。

10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5-118页。

11 林甘泉、蔡震：《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

城尝试“利用历史课联系现实，讲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并每日勾画报纸中之重要新闻”，其中《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是读报会的重要材料。¹²此外，研究系亦凭借《时事新报》的影响增进了与青年学生的政治联系。据张国焘回忆：“《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是我们有经常的接触。一九二〇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罗家伦、许德衍、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¹³毛泽东不仅在《湘江评论》中经常引用《时事新报》言论，而且曾多次就湖南自治运动问题向《时事新报》投稿，包括《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等。¹⁴

然而，这一系列变化并未完全改变《时事新报》作为政党报的性质。研究系将《时事新报》视作重组政党的舆论阵地，且维持着对该报言论方针、管理方式与产权关系的掌控。而由于研究系在后五四时期始终未能集结为政治势力，这为《时事新报》由政治喉舌转向公共论坛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言论方针：《时事新报》奉行梁启超的“中坚政治论”

《时事新报》的前身为1907年的邵松权等人集资创办《时事报》，其后曾多次转手于官商之间。¹⁵1911年5月18日，《时事报》正式更名为《时事新报》（the China Times），自此成为张謇、张元济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¹⁶辛亥革命后随着立宪派政党重组合并，该报由此成为共和党进步党

12 吕达、刘立德：《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93-995页。

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4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15 陈捷：《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第169页。

16 在《时事新报》面世前后，张元济曾多次致信梁启超，希望其加入该报：1911年5月12日，张元济致梁启超信中称：“日报近稍稍布置，拟即日更换面目……前书谓日报为不可缓之事，将至台湾有所谋划，不知果有端绪否？”5月31日，张再次致信称：“《时事新报》为弟与梦旦数人所组织，仍延伸谷（笔者注：指汪诒年，系汪康年胞弟）综理社事，已属发报处按期邮呈，敬祈教正。”（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北京：商务

—研究系的机关报，在言论方针上奉行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提出的“中坚政治论”。

这一政治学说的基本观点为：其一，知识分子是理想的执政阶层：“在有中坚阶级之国，则以此少数之中坚阶级为根干，乃擎衍枝叶，以成多数。斯发育有序，盛美可期。”这里指的“中坚阶级”指的就具有学识和德性的知识分子，“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之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¹⁷其二，民主共和与国会制宪是理想的制度选择：“既认为可以行君主立宪之国民，自应认为可以行共和之国民。”¹⁸其三，渐进改良是理想的实践路径：“欲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此非可以坐而致也，必谋所以促进之者，于是保育政策尚焉。”¹⁹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虽退出上层政治，但其文化事业的动机仍是“教成选举人、教成议员、较成新式文官”，以此重塑国会制度。其中，通过职业代表制训练知识分子参政能力是重要环节：“要恢复国会价值，根本就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²⁰

“中坚政治论”的基本观点在《时事新报》社评中皆能得到印证。在曹锟贿选与国民革命兴起的背景下，《时事新报》仍将中国政治的前景寄望于改良国会制度。针对1921年后南北国会分庭抗礼的局面，该报采取作壁上观的姿态：

“造国是什么？就是从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国家组织的状态上建立一个合理的国家组织，这个组织是三方面来表现：一是政府的构造必须合于民治的原理，二是社会的组织必须合于正义的原理，三是国际的地位必须合于平等的原理……现在一班人所认为合法的都是我们所认为不合理

印书馆，2008年，第217-220页。）

1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99页。

18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07页。

19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91页。

20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83页。

的，所以我们敢大胆说自有民国以来，政府的组织始终是没有合理过，这是第一个失败的证据。第二是社会的组织也没有经过合理的改造，第三是国际的地位没有增进，所以双十节乃是纯粹有名无实的。我们提起双十节来，那便椎心泣血，自己责备自己的不努力，那里还应当歌舞升平呢？”（时事新报，1922年10月10日）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使国会面临信任危机，但《时事新报》仍呼吁知识分子培养政治道德：

“共和初成，革命党即腐败化了，于是烂政客纷纷而起，最初尚知与军阀相抗，以自身不能克制私欲的缘故，于是竟直接供军阀的利用了，所以军阀的猖獗实在是这班智识阶级所酿的……为今之计，只有设法保留一部分知识阶级的清明之气，将来逐渐推广，一方面尽力向黑暗宣战，经比较长期的培养，必有复苏的希望。”（时事新报，1922年10月10日）

1925年4月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正式废除国会后，各派军阀内斗加剧，北伐战争亦蓄势待发。对此，《时事新报》仍缘木求鱼地呼吁通过职业代表制组织国民会议：

“由二十二省军民长官，联合推定二十二人，组织国是会议，二十二人全数以曾有之法（约法或宪法）为可用，再以电征全国各省法团之同意，多数同意之后，咨由北京当局依法执行。北京当局即行解职，若有（一）一省之法全数反对者或（二）各省同一性质之某一种法团全数反对者，或会议内之二十人争持不决者，由国是会议决定向各省现存法团征集公意之方法，交北京当局执行之。在根本法决定之前，中央各省间，或各省与省间，发生争议时，由国是会议判断之。过渡时代之勉求中，平理合乎情者，此非办法坎。苟尤为事实所不许，则请国人姑弃定国是之奢望。”（时事新报，1926年1月23日）

总而言之，《时事新报》始终在国会制度的框架内提出国家建设方案，其目的在于建立知识分子的执政地位。这一方案既不能解决军阀擅权的体制弊病，亦无法呼应社会各界对代议制合法性的质疑，其最终被国共两党发动的国民革命所取代，而《时事新报》势必要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阵营中抉择。

（二）管理方式：《时事新报》遵循松散的同人办报模式

区别于列宁主义的党领导报刊模式，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并非组织严密、由政党直接掌控的舆论机构，而是有着相当独立性的民营报纸。无论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还是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都曾表达过统一党报宣传的企图，但由于思想庞杂、组织涣散等原因并未实现。就后五四时期的《时事新报》而言，除了担任社长、总经理的黄群为研究系重要成员外，大多数《时事新报》社员仅可视为研究系文化事业的参与者。

《时事新报》社长、总经理黄群是研究系在南方部署文化事业的重要主持人，对《时事新报》人事变动掌握绝对支配权。这体现在：在护国运动期间，黄群是梁启超的亲密战友，负责游说江苏督军冯国璋反对袁世凯复辟，并借助其电报暗通云南护国军政府。据其回忆：“任公第一次托冯代致松坡之电，在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该电于云南起义大有关系，因滇中接到任公由南京所发一等印电，松坡即当中宣布，而大众以为任公已经到宁，冯已同情起义可以响应故也。”²¹在五四运动期间，黄群除了要经营《时事新报》，还要为研究系各项文化事业筹措资金。梁启超欧游回国前，张君勱就研究系文化事业的构想致信黄群“惟在欧所商不止一事，敢为公言之，并望将其先后次第，详加讨论焉”，并希望黄群不仅要经营好《时事新报》等出版事业，同时要参与统筹诸如中比贸易公司、中比轮船公司、月报及印刷所、大学、派遣赴德留学生等事宜，以解决“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

2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3页。

举，无忧着手”的问题。²²针对《时事新报》事务，黄群虽不直接参与管理、委任各部自行运转，但是针对涉及报馆生存的重大人事问题仍有支配权。据曾任《时事新报》副总编辑的何思诚回忆，黄十分热衷于金融地产投机，担任通易信托公司总经理，“日常都在通易办公，很少来报馆”。尽管馆务分任主笔、总编辑、经理掌管，但重大问题他有全权：“如财务垫款、经费预算，以及购置纸张、油墨、铅料等，最后要取决于黄。通易公司内有黄的亲信刘放圆、郭虞裳，也参与报馆大事的谋划。黄还责成该报编辑部，凡有政局变动、经济市场出现重大风潮等消息，都要尽快用电话报告他。”²³

相较而言，《时事新报》的主要社员与梁启超的远近关系不一，且大多并未参与研究系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主笔张东荪是研究系中较为特殊的一个重要成员。张东荪深得梁启超和黄群的信任，亲手规划了《时事新报》改版以及筹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后者被杜威称作与《新青年》《新潮》齐名的“新文化运动喉舌”。²⁴但他仍保持着相当独立的政治见解。在孙中山逝世后，张东荪的言论不仅导致报馆遭遇炸弹袭击，而且给研究系的政治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这迫使黄群辞退其主笔职务。²⁵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梁启超亲自前往吊唁，²⁶张东荪则以“圣心”为笔名尖刻讽刺之：“可见，孙文显为两人，革命时代有学气、有思想之孙文也，知爱国、知保种之孙文也。可以此孙文自二次革命以后已死去矣。此后数年所余之孙文，勾结军阀之孙文也，谄俄兼媚日之孙文也……”（时事新报，1925年3

2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69-470页。

23 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24 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1921-192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25 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44-146页。

2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47页。

月13日）潘公弼是《京报》社长邵飘萍在日本留学的同学，其于1919年出狱后进入《时事新报》，后担任总编辑。他比梁启超小二十余岁，虽未有史料证明他与梁启超有直接往来，但其主持报馆期间的言行无不彰显对梁启超的崇敬：“要职员把报纸看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说这是‘任公先生’历来所倡导的。”²⁷副总编辑何思诚则以职业报人自居：“我是1923年下半年进该报的（笔者当年在旧报界向叫何西亚），从助理编辑起，先后担任过要闻编辑、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至1931年底因故离去，在职共八年。”²⁸

同时，《时事新报》馆职员流动性高，不少曾担任主笔、编辑、记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与梁启超等研究系诸人并无交集，而是通过黄群、张东荪等主要社员的关系在该报短期任职。邵飘萍曾在护国运动后担任《时事新报》主笔：“袁氏称帝进行最激烈之日，因沪友电招而归国，又以东京通信之关系，居沪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²⁹在段祺瑞、黎元洪执政后，邵飘萍不再担任该报主笔，转赴北京担任《申报》特约通讯员。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张君勱在1916—1917年曾短期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辑，后留学德国，³⁰遂由张东荪于1917年4月接替其职务。（时事新报，1917年4月9日）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茅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态度与研究系明显相左，但是其仍受张东荪委托于1920年11月担任了“二三个星期”的《时事新报》主笔。³¹此外，宗白华、郑振铎、俞颂华等知识分子受张东荪的邀请担任《学灯》编辑等职务。

概言之，后五四时期的《时事新报》遵循同人办报的管理方式，其报馆

27 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28 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29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北京：京报馆，1923年，第161页。

30 李贵忠：《张君勱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31 雷超：《茅盾代理〈时事新报〉主笔史实及新发现的佚文考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4期。

职员政治立场不一，大多数亦为直接参与研究系的政治活动。

（三）产权关系：《时事新报》是研究系经营的舆论据点

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时事新报》始终是立宪派政治团体掌握的民营报刊。1911年5月由《时事报》更名为《时事新报》，由此成为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但尚未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发生直接联系。随着辛亥革命后三大立宪派政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并由梁启超、汤化龙担任实际的政党领袖，《时事新报》于是成为进步党机关报。据曾任该报经理的张云雷（即张烈）回忆，《时事新报》最初由张謇办南通博览会赚来的钱创办的，委托秘书孟森主持。在报纸“蚀了本”的情况下，梁启超委托黄群收购该报：“报纸的生意仍然不好，黄溯初等人主张停办算了，梁启超却仍坚持一定要办下去，他说：‘我们的政见别处不让你发表就不能发表，自己手里有个报纸就好办’。”³²

经历1918年国会竞选的失败后，《时事新报》等报刊被研究系诸人视作重组政党的舆论据点。同时，由于《时事新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不得不依靠研究系资助维持运转。1920年10月，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的傅治致信《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论及报纸改版应为研究系发展党势服务：

“今之所急，一在立事业而图发展，一在定主义而事宣传，然后方有真团体之组织，须知组党虽非其时，而团体则不可不早结报馆一窘至此，决非办法，衡以欧西报纸，竟是笑话。须集大款（至少三十万）求大发展，或改组股份公司性质，开放与一部资本家，或借社会后援，公诸一部分社会同志，另组董事部，为报馆最高管理机关，此书曾与君劭细谭，似以开放于一部资本家较有把握，如张季直等当可求其帮助。改组新局，务为中国唯一大报，此事祈与溯初先生等平情细想，或能设法开

32 张云雷：《〈时事新报〉忆旧》，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一新路，君劭以为如果有意，极易办到也。”³³

改版后的《时事新报》虽然在文教界建立了权威地位，但销量依旧有限，未能摆脱营业亏损的境地。“前得手教久未复者，以无事可告耳。报馆经费已得亮济报告，仅有三月之粮，唯此时即闭门亦万无此办法。日前与溯初、云雷、放园会商，先行节流，已大裁员，即荪亦捐所入之一部分，于是每月共省去五百元光景，尚不足两千，或可支持至年底亦未可知。”³⁴迫于报馆经营的财务压力，梁启超曾于1923年3月致信陈叔通、黄群、张东荪、张君劭等研究系同人商议出售《时事新报》：“对于《时事新报》问题，此间之意见及进行方法，想已详达。现在情形除此亦别无办法，想诸供皆所赞同也。售主正着手交涉，有无效果殊不敢知。”³⁵

最终，国民革命的爆发不仅打破了研究系组织政党的计划，而且迫使《时事新报》最终脱离了研究系。一方面，研究系始终未能就组织政党达成共识，亦未能推举出足以组织政治势力的核心人物。受国共合作形势的刺激，研究系在1924年夏曾商议组织以“学者和商人”为基础的政党。主持中国公学的陈筑山致信梁启超：“所谓学者与商人的团结，只重在中心势力之造成，所执的指导，安能与崇拜列宁偶像的团体相对立。而吾人今日欲扎硬寨以备将来打死仗，非将公学基础建筑巩固，徐图扩张，网罗经济的人才不可。”³⁶但是此时的梁启超不仅对政治已然心生退意，且无法在政治上左右研究系诸人。1925年11月，针对研究系成员各自行动、缺乏组织领导的问题，梁启超致信女儿梁令娴称：“国内近来乱事想早知道了，这回很不容易结束，现在不过才发端哩……儿子长大了，老子也没有办法干涉他们的

3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85页。

3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07页。

3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25页。

3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38页。

行动，何况门生和后辈？即如宗孟去年的行动（笔者注：指林长民担任郭松龄幕僚，助其讨伐张作霖的行动），我并不赞成，然而外人看着也许要说我暗中主使，我从那里分辩呢？”³⁷另一方面，虽然经过1924年业务改革后的《时事新报》经营效益大为改善，但由于该报言论见忌于国民党，不得不最终脱离研究系。江浙战争期间，《时事新报》在总编辑潘公弼的领导下，以“营业本位”为中心对各项业务进行改革，成效显著：“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居然一跃而超越时、商二报（笔者注：指《时报》和《商报》），为走向第三位打开了局面。”具体措施包括：“一、讲求版面编排，注重阅读醒目”，“二、年终不休刊，独占销路”，“三、利用战时增印‘号外’扩大影响。”³⁸然而，由于北伐前夕《时事新报》社长黄群预感局面终难撑持，“乃通过银行界张公权居间，悄悄地让渡于《申报》的史量才，而由史委其经理张竹平出面接盘。”³⁹为保障《时事新报》在革命后不被查办，该报经理林炎夫在北伐时亲赴江西，请求蒋介石予以疏通，“终于拿到了蒋总司令‘准予照常出版’的手谕，回到上海。但是自此以后，该报的态度，突然改变，拥护革命，宣传主义，不余遗力，并延请陈布雷为主笔。”⁴⁰1927年8月1日，《时事新报》刊登《让受》社评，标志着该报正式脱离研究系，成为《申报》史量才、张竹平等合资经营的商业报纸。（时事新报，1927年8月1日）

综言之，所谓政党报也就是为政党宣传、为政党组织、受政党资助的报纸。后五四时期的《时事新报》在言论上始终奉行研究系领袖梁启超的“中坚政治论”且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依赖于研究系诸人的资助。就政治身份而言，研究系诸人虽有较明显的政见倾向，但缺少固定的党团身份或者所属政

3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67页。

38 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40-143页。

39 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40-143页。

40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第58-59页。

团，处于组织松散、缺乏相互约束的状态。就政治影响而言，后五四时期的研究系始终未能重新集结为政治势力，《时事新报》亦随革命形势所迫而迅速脱离研究系。因此，改版后的《时事新报》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喉舌。

三、公共论坛：《时事新报》言论栏目聚合的知识精英

以政论汇聚人气、组织政党是立宪派政党创办《时事新报》的基本方针。1911年5月18日，《时事报》更名为《时事新报》并刊登《本报宣言》：“宪政目的既定，乃有选举议会，聚天下之政客而相见于京师，聚各省之政客而相见于都会……敝社同人决其必为天下政家所渴想，而特苦设一定之机关，为之执交通之役焉耳。”（时事新报，1911年5月18日）

基于此，1920年元旦《时事新报》宣称打造“全国文化运动的中心”的同时仍体现着研究系诸人“改党组党”的政治取向：“我们认为，言论事业、新闻事业都是终身的事业。干这种的人必定‘锲而不舍’且要‘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们虽然浅陋，却也自发誓不怕强暴，不怕辛苦，总要这个立脚地上奋斗出光明来。”（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1922年6月上海举行国是会议前夕，《时事新报》正式宣布对言论栏目进行改版：“旬月以来，投稿日敝数起，此诚国民注重国事之好现象也。惟本报向以投稿列入评论，致地位有限，每有遗弃，现改为‘社评’与‘时论’两种。社评有时或缺，于有社评时则移时论于第二张中。庶几篇幅较大，同时得刊多篇。尚望关心时事者多多赐稿，郁为决战的舆论。是所盼切。”（时事新报，1922年月22日）

随后，《时事新报》言论栏目逐渐聚合起一批以江浙地区为主的知识精英构成的撰稿人群体。撰稿人群体的出现以及社外稿件比重的上升说明后五四时期的《时事新报》言论栏目兼具党派性与公共性的社会功能。下文将从社会背景、身份认同、政治形象三个层面讨论《时事新报》撰稿人的特征及其与研究系的关系。

（一）社会背景：拥有稳定职业与地位的知识精英

胡适曾指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以1923年为界可分为两期，前一期多“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期则为“集团主义时代”。⁴¹随着中共成立、国民党改组和中国青年党成立，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中小知识青年纷纷入党、投身革命，知识精英则大多坐而论道，或以阻碍、观望、支持的姿态影响革命形势。⁴²在此语境下，《时事新报》言论栏目成为知识精英谈政治的公共论坛。

《时事新报》主要撰稿人可分为研究系成员、《时事新报》社员和社外撰稿人三类，且前两类占多数。研究系领袖梁启超虽不直接参与报务，但是其撰写的言论往往被该报视作社评和代论刊登，如五卅运动期间《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沪案交涉方略告政府》《对欧美友邦之宣言》《答北京大学教职员》等。同时，梁启超还是《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的撰写者。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该报总编辑潘公弼撰写的言论数量居于首位。而为了避免报馆营业遭受言责影响，潘公弼在1925年3月张东荪卸任主笔后实行轮流分写制：

“评论不设专职主笔，改为多人轮流分写制，保持每日不间断特色。撰述者均经事先聘定，含有半固定约束性，每周聚餐一次，对七天内的分工题目初步商定大体，如发生特别大事，领事统治该门类执笔赶写交卷，并约定锋芒，凡涉及国内时局重大问题，尤当持审慎态度。”该报言论工作的具体分工为：“国内问题为张君劢、曾友豪，国内问题为潘公弼、张君劢、程沧波，经济为王孝文、戴蔼庐，教育为潘仰尧、朱步

41 沈卫威：《胡适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第227页。

42 王奇生曾对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并以入党为荣的潮流进行多方面解读：其一，五四爱国运动激发青年学生的参政热情，各种“主义”信仰的流行促使青年入党。其二，就业难、求职难的社会压力促使青年学生容易萌生反叛意识并通过入党解决生计问题。（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32-38页。）

兰、法律为陆鼎揆、吴颂皋等。”⁴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报在国民革命时期被斥为“反革命”报刊，但该报言论栏目并未形成清晰的党派界限，甚至出现了中共党员华林的投稿。据《华氏宗谱》介绍，华林于1923年由陈独秀、罗亦农介绍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24-1927年受组织派遣“在杭州、宁波两地负责党的秘密联络和发动群众开展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⁴⁴这一记载在中共党组织文献中得以印证。⁴⁵不过，华林的撰文相当程度上接近醒狮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如《堕落的民族》中对“谈共产者崇拜马克思”持怀疑观点，这似乎是其从事地下活动的一种掩护。（时事新报，1926年6月1日）此外，经济学家马寅初、财政学家童蒙正、宪法学家陈茹玄等社外撰稿人与研究系并无交集，其言论侧重各自所擅长的专业领域。具体特征是：

其一，就出生籍贯来看，《时事新报》撰稿人主要来自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四川以及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为数不多的撰稿人来自黄河流域的山西、河南。即便考虑到人口流动性因素，这一分布特征仍能反映《时事新报》的发行范围主要为南方省份，因此其言论趋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江浙为主的南方省份知识分子的时局认识。

其二，从年龄构成来看，《时事新报》撰稿人大多为1890年代到1900年代出生，在国民革命时期已成长为30周岁上下、在口岸城市定居、拥有高水平学历、稳定工作和体面收入的知识精英。出生于1870年代到1880年代的撰稿人占比较少，主要为具有舆论影响力的社会名流，包括：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勱、章炳麟、汤尔和等。

其三，从教育背景看，《时事新报》撰稿人大多就读于科举制废除之后

43 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44 华之平：《华氏宗谱》，杭州：浙江富阳富春街道，2007年，第31页。

45 中共宁波市党史研究室编：《宁波中共党史人物1925-1949》，宁波：宁波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的新式学堂，并继续出国留学或在国内深造，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13人（占生平可考者总数的1/5），专业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医学、地质学为主，极少数为哲学、文学。

其四，就职业身份来看，《时事新报》撰稿人主要来自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和政界，在地域上集中分布于上海、南京、北京，在职务性质上多为报馆、出版社的正式职员，高等院校的教授、校长以及北洋政府职能部门的高级官员等。这些职业入门槛高、能接触的社会资源广泛，对于刚高中毕业、尚未进入大学的中小知识青年有相当的吸引力。此外，亦有一些一般撰稿人为在读大学生，他们虽无正式收入，但都大多未投身于革命队伍，而是以无党派的态度自居。

其五，从党派背景来看，《时事新报》撰稿人以无党派人士居多，且他们大多在革命结束后任职于国民政府，其中亦有一部分加入了国民党。部分撰稿人具有醒狮派、中共党员、国民党党员身份，其中除了中共地下党员华林为主要撰稿人外，其余皆为一般撰稿人。

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方式与其生活处境有密切关系。《大公报》曾指出中小知识青年投身革命主要受到失业形势所迫：“每年增加数万智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增加数万智识阶级之革命者。国十五年矣，以抽象的统计，此种智识阶级因生计而迫于过激者，已在数十万以上……”相较而言，《时事新报》撰稿人显然不属于上述“智识阶级之失业者”行列，而是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拥有稳定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这一舒适安定的生活环境促使他们倾向于渐进改良而非激进革命，宁愿在国会制度的框架内寻求政治空间，抗拒群众运动和军事讨伐所带来的社会动荡。

（二）身份认同：“中等社会”的士大夫想象

“中等社会”是晚清民初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他们虽身处于国家政权的边缘地位，却仍胸怀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而正是这种忍不住的关怀促使他们通过报刊宣传理念、组织舆论动员。所谓“中等社会”就是要“破坏上等社会”和“提携下等社会”，即取代腐朽的统治集团并领导农工为主体

的劳苦大众。⁴⁶《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所设想的共和政治就具有典型的“中等社会”认同。四运动后，时任《时事新报》主笔的张东荪为回应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针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性质提出中国社会有四病——“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并认为只有绅商阶层可以兴办实业，为人民提供机会、改善生活：“绅商阶级初起的好处，在吸收求生不得的人为劳动阶级，于无形中增加些富力，亦稍微提高些知识。其最大的好处，就是瓜分军阀而免去内乱”。⁴⁷1923年，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加速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此背景下张东荪仍然坚持唯有“知识阶级”才能救中国：“我不相信中国劳动阶级在一二十年内能握得政治的重心。即有以劳动党为名的，亦必仍是知识阶级的变相，不是真正的工人。但是我们一方面，却不能不认定现在的知识阶级是堕落了，兹总括我的意见如下：一、民族的衰亡以知识阶级的堕落为先河；二、中国今天确是知识阶级已衰颓了；三、欲救中国不外培养知识阶级的不怕死的壮烈精神。”⁴⁸

与此同时，《时事新报》撰稿人颇以士大夫自任，渴望从政的心态与日俱增。1924年3月，萨孟武在《中国士人阶级之社会问题及社会政策》中提出知识分子数量与日俱增却无法跻身仕途的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中之最大之问题”，直接原因是“顾今日国家要职，非以才干为标准，乃以权势为夤缘，有权势者虽愚蠢亦居高位，具才干者贫贱亦在下流，所谓公平标准，扫地无遗。夫才力，攀登至高地位，今二三人物，不费微劳，而今自己子弟亲族，占据要津，且复轻蔑才智，则彼辈士人之自由思想，对于社会之不自由状态，发生挑战之心，势之必然”（时事新报，1924年3月23日），根源在于中国政治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名为平等，实则无形之只中，常分为士人阶级及庶人阶级二种”，若士人阶级别无出路则国家必然陷入混乱。（时

46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48-255页。

47 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东荪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0-159页。

48 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东荪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5页。

事新报，1924年3月22日）为解决知识分子出路狭窄的问题，他提出三点对策：其一，改良官吏制度：“夫中国士人阶级所以必欲获得官位者，实官位其诱物本有引士人宦心智魔力也。”其二，树立面向职业技能的教育理念：“是故今日教育问题，非为如何可以制造无数卒業学生，乃为如何可以养成学生独立能力，使其知所应用，不至违背所学，而奔走于寄生门径。”其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故吾人若欲救济士人阶级之生计困难者，惟当应用资本于其中也。夫企业发达之时，当用无数高级雇员，而经济愈见进步，则其人数亦愈加多。”（时事新报，1924年3月24日）1926年9月，署名白的《乱世之智识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无治国担当，唯学历至上的风气予以批评：“教育界者，今日社会凝聚力之中心，而我国相沿之士大夫阶级也。国是大坏，若此社会中心之智识阶级，尤能稍留一脉之正气，则兴衰起颓，尤有几微之望。如其未也，则亦已耳。教育界之今日，其£茸萎滥之态，盖尤逊清季年之仕途。”（时事新报，1926年9月5日）在无力改变政治黑暗的现实下，他们对知识青年投身学潮、参加革命屡屡表示担忧。1924年1月，武汉大学教授彭基相劝告学生：“凡做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的人必先要有智识和能力（大前提）而智识和能力是由读书中得来（小前提）固学生要想做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必先要读书（结论）。”（时事新报，1924年1月6日）同年6月，留德学生杨龙济批评国内学潮为“误国”：“故吾辈青年，不欲救国，不欲达到军阀则已，否则其各闭门读书，寒窗十年，终有展才救国之一日也。若以愚言为非计，则试思吾等与如狼似虎之军阀，奋斗已数载，罢课将百次，我等之损失若是指巨，而彼卖国者仍理其旧生活，恶军阀仍然杀人不眨眼，国事日非，果有何益乎？呜呼？国人此时不悟，则将来亡国之罪，吾辈亦有分焉。君子小人，同一误国，则其罪维均也。”（时事新报，1924年6月16日）

综言之，官吏选拔腐败、学历滥竽充数、学生罢课游行等皆被知识精英视为越轨行为，这反映出他们对于“读书”和“从政”有着非常清晰的边界意识，这种边界意识建立在他们对于传统四民社会“学而优则仕”古典秩序的想象之中。

（三）政治形象：处于军阀与国共之间的“中间势力”

在身为职业革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研究系与知识精英属于成分复杂的“中间势力”。所谓“中间势力”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于资产阶级性质的系列论述。历史学家胡绳指出，它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文教界等资产阶级乃至工农群众，“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都自动跟着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着共产党走。”⁴⁹针对研究系与《时事新报》的政治性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判断经历了如下过程：

最初，中共将研究系视作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阶级”，呼吁其要清醒认识军阀的反动性质。针对曹锟贿选后《时事新报》社评“承认即等于否认，否认也等于承认”的态度，《向导》周报督促其坚定反对北京政府及其炮制的宪法：“我们盼望研究系诸人勿看轻自己！”⁵⁰但随着中共与研究系在蒙古问题论战的分歧凸显，中共开始将研究系归为“反革命”阵营。⁵¹北伐前期，研究系要员蒋方震、丁文江直接加入了直系军阀孙传芳阵营，这促使《向导》周报进一步指责《时事新报》的“反革命”性质：“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天天反对北伐军，自称为‘反国民革命者’，这是当然的事！”⁵²可见，中共侧重将《时事新报》视作研究系的舆论喉舌予以批驳，但相当程度上忽视了该报所反映的知识精英的政治见解。

综言之，后五四时期的《时事新报》言论栏目主动扩大社外稿源，为知识精英提供了“文人论政”的公共论坛。这些撰稿人大多在文教界任职，论政而不参政，他们虽借助《时事新报》发表政见，但并非因此与研究系建立直接联系，亦未成为后者重组政党的社会基础。他们虽自居于改造中国政治

49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页。

50 独秀：《研究系与中国政治》，《向导》，1923年第43期，第3页。

51 存统：《革命与反命：评〈时事新报〉底根本态度》，《评论之评论》，1924年第3期，第5-7页。

52 实：《请看研究系站在那一边？》，《向导》，第177期，第10页。

的中坚力量，但实际上构成了军阀与国共之间的“中间势力”，具有摇摆不定的特征。

结语

在中国新闻史的典范叙事中，王韬与《循环日报》开启了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传统。区别于新记《大公报》的新闻专业主义诠释社群，《时事新报》的职员流动性高、政治依附性强，似乎并未对中国新闻事业现代化产生过持续且深远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民国的报界、政界与文教界水乳交融，这种特质从《时事新报》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基于此，本文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1920年元旦《时事新报》宣称从政党报改版为“全国文化运动的机关”后，该报言论代表了何种社会群体的声音？

通过分析《时事新报》的党派背景与撰稿人群体，本文认为改版后的《时事新报》言论栏目具有政治喉舌与公共论坛的两重性：一方面，在1927年8月《申报》史量才、张竹平接办之前，《时事新报》始终是研究系诸人共同的文化事业并将梁启超的“中坚政治论”视作言论方针。另一方面，《时事新报》聚合起一批江浙地区为主的知识精英，他们大多具备英美留学背景、拥有稳定职业和社会地位。在政治上，尽管他们大多数无党派背景，但是都共享着“中等社会”的身份认同，支持梁启超的宪政改良理论。而由于研究系与知识精英在政治主张上的相似性，《时事新报》言论基调在整体上仍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而就政治格局而言，《时事新报》的两重性与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派系、政治派别的分化密切关联。如果说清季的“中等社会”所指涉的改良与革命派知识分子尚可在推翻满清的旗帜下发动辛亥革命，那么曹锟贿选后的两派知识分子则趋于剑拔弩张之势：一方面，随着曹锟贿选后国会制度趋于崩溃、革命派知识分子借鉴苏俄模式集结为军政集团，这表现为国共两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党内合作，发动以反帝废约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另一方面，改良派知识分子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以研究系、醒狮派、

胡适等自由派等知识分子群体既反对军阀割据、亦不认同国民革命，实际上成为了北洋军阀与国共两党对决之间的“中间势力”。